

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福利效应

——基于风险分担的视角

黄险峰 刘姗姗

(辽宁大学,沈阳 110036)

内容提要: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增进居民福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基于传统行为经济学和贫困心理陷阱理论,以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风险分担属性为切入点,使用2012年到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DID)模型、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模型等研究方法,揭示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福利效应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放宽经济约束,增加居民消费支出,提高个体的物质福利,也可以通过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对未来信心和社会地位认同感增进主观福利。进一步探究发现,政府公共转移支付能够帮助居民分担健康、收入风险,增进个体福利。从分样本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对男性、低教育程度、中青年、农村及中西部群体的福利效应更大。因此,致力于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和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应重视公共转移支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公共转移支付 风险分担 居民福祉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4)02-0040-14

一、引言

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贫困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制约着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范燕丽,等,2021)^[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扶贫工作上做了许多探索,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效。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但在统计意义上绝对贫困的消失并不意味着贫困治理的终结。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

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巩固已有脱贫成果,合理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水平已然成为反贫困工作的重心。一直以来,政府都将公共转移支付作为消除贫困和增进民生福祉目标的重要之举。那么,政府公共转移支付是否有助于增进民生福祉、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其中的作用机制是什么?研究这些问题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研究政府公共转移支付与民生福祉问题时,不能忽视低收入群体的贫困心理特征。一方面,从贫困心理视角分析问题,有利于避免在理解贫困上

[收稿日期]2023-07-28

[作者简介]黄险峰,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刘姗姗(通讯作者),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收入分配。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家庭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机制及干预对策研究”(20CSH034)。

出现误区。例如,有人把贫困的原因归咎于低收入群体的懒惰和不努力,认为扶贫毫无意义,这样不仅会减少对低收入群体的援助,而且会加大贫富差距,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考虑到大多数政策制定者通常重点关注对低收入群体的物质援助,可能会忽视低收入群体的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从目前研究的进展来看,尽管已有学者对公共转移支付的主观福利效应给予关注,且不乏学者认为政府公共转移支付有利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主观福利水平(高琴,2018)^[2]。但是这些研究却忽视了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在增进民生福祉、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风险分担属性。因此,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帮助低收入群体分担风险是否能更有效地促进共同富裕值得深究。基于以上考虑,本文从风险分担视角出发,来探讨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对增进民生福祉的影响。

相较于既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本文基于中国现实特征,厘清公共转移支付福利增进效应的理论逻辑,并提供经验证据。第二,以微观个体作为考察对象,关注公共转移支付的“物质福利”和“主观福利”等福祉增进效应及作用机制,不仅分析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如何增进福利,而且在作用渠道上进行具体的分析。第三,基于传统行为经济学和贫困心理陷阱理论,以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风险分担属性为切入点,探究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如何通过风险分担机制将增进民生福祉转化为现实。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福利的影响

大量研究证实了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对于福利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在宏观层面上,刘穷志(2008)^[3]采用GMM估计方法分析了政府转移性支

出的减贫效果,结果表明政府转移性支出有效地促进农村地区收入增长,减少农村贫困。政府转移性支出越多,收入越平等。在微观层面上,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可以通过增加贫困户的收入实现扶贫效果(卢盛峰,等,2018)^[4],也可以间接通过增加个体消费水平、主观福利等减缓贫困(边恕,等,2021)^[5]。因此,政府对私人的公共转移支付可以通过增进居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两种效应。

首先,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具有物质福利增进效应。一方面,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直接带动低收入家庭整体收入水平提高,放松低收入群体的经济约束,有效地改善低收入群体物质条件和生活质量,满足低收入群体基础性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公共转移支付除了能缓解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贫困”外,在对低收入群体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可行能力”方面也发挥重要作用。长期以来,贫困剥夺个体在教育、健康、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可行能力”,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可以减少低收入群体的家庭教育负担、健康、农业生产等家庭背景风险,提高低收入群体在医疗、教育、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支出,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生产力水平,从而提升福利水平。

其次,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具有主观福利增进效应。理论上,个体行为通常受到自身意志和信念的支配,当低收入群体产生强烈的脱贫意愿和信心,将会通过积极采取行动,从而达到脱贫效果。一般来说,不同于富人喜欢冒险及追求长远利益,低收入群体更倾向于当前利益,缺乏对未来的信心和耐心,从而产生更多的风险规避行为,导致低收入群体脱贫困难(徐富明,等,2017)^[6]。而政府公共转移支付除了带来经济福利上的改善,在低收入群体对自身经济地位的主观认识方面同样做出了很大贡献。具体而言,农村低收入群体普遍面临谷物歉

收、旱涝灾难等无保障性风险,而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低收入群体因处于弱势地位而产生的悲观、风险厌恶等心理,增加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提高主观上的幸福感。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政府公共转移支付能够增进个体物质福利、主观福利来改善居民福祉。

(二)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福利的作用机制

从传统行为经济学视角看,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长期受到“流动性约束”和“背景风险”等因素的限制(尹志超,等,2021)^[7]。“流动性约束”减弱低收入群体跨期平滑消费的能力,使得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随收入剧烈波动,长期以来,导致低收入群体消费水平很低(Banerjee and Duflo,2008)^[8]。除此之外,相较于富人,低收入群体通常缺乏被保险资格,当出现劳动收入减少、家庭成员身体状况变差的情况时,持有高水平风险厌恶的低收入群体,会进一步降低消费倾向(Guiso and Paiella,2008)^[9]。因此,低收入群体长期面临金融市场严重的信贷约束以及缺乏被保险的背景风险,在面临疾病、失业和自然灾害等外生冲击时,不及富人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生存环境,无法摆脱贫困状态。部分经济学家在传统行为经济学理论机制基础上提出贫困心理陷阱理论(Haushofer and Fehr,2014)^[10],将低收入群体的认知、自控能力和意志力等心理特征作为影响经济行为和决策的潜在作用路径。相较于传统行为经济学理论,贫困心理陷阱更具有现实解释力。他们认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群体持续产生压力和负面情感,这种负面效应可能会导致低收入群体产生非理性认知,对风险承担等经济行为可能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洪名勇,等,2018)^[11],做出风险厌恶的经济决策,进一步影响经济决策质量,从而降低自身福利水平。

政府对私人的公共转移支付能够帮助低收入群体分担风险,减小风险敞口。低收入群体长期受到“流动性约束”和“背景风险”等因素的限制,产生风险厌恶和负面消极等心理特征,这种持续产生的压力和负面情感,对经济行为和决策可能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政府对私人直接现金转移支付为低收入群体改善了外部经济和物质条件,通过分担低收入群体面临的健康、收入等风险来进一步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和生产,帮助低收入群体摆脱贫困心理,从而提升福利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有待检验的理论假设2。

假设2: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福利增进效应的发挥取决于风险分担机制的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首先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福利增进效应,具体模型为:

$$Pov_{it} = \alpha + \alpha_1 Tr_{it} + \alpha_2 X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下标*i*代表个体,*t*代表时间;*Pov_{it}*表示居民富裕程度;*Tr_{it}*表示个体是否获得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相应年份已获得则*Tr_{it}* = 1,否则*Tr_{it}* = 0;*X_{it}*表示其他随时间变动影响居民贫困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地区特征变量;*μ_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剔除其他因素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更好地评估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福利增进效应,本文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进行重新估计。考虑到新冠疫情不仅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同时对被调查者的生活满意度、压力感知以及主观幸福感都产生了显著影响(李树,2022)^[12]。因此,为了避免新冠疫情冲击可能会导致的数据异常,遂以2018年作为研究样本的截止年度。具体操作时,借鉴解歪等

(2022)^[13]的做法,将2012年设定为基期,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为政策干预期,同时保留2012年没有获取公共转移支付的个体样本,将其与2014、2016和2018年个体样本进行匹配得到多期面板数据。具体模型为:

$$Pov_{it} = \alpha + \alpha_1 treat_{it} \times year_t + \alpha_2 X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treat_{it} = 1$ 为实验组,表示2014年—2018年均获得政府公共转移支付; $treat_{it} = 0$ 为对照组,表示2012年—2018年均没有获得政府公共转移支付; $year_t$ 表示政策实施期变量; α_1 表示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福利效应的大小。此外,本文会进一步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模型对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福利增进效应再检验,以减少样本在政府公共转移支付政策实施前存在的显著差异。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本文采用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实证分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通过追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3个层次的数据,重点关注了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以及包括经济活动、教育获得、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移、身心健康等在内的诸多研究主题,样本具有较强代表性。经过数据清理后,共获得8804个有效个体样本。

1. 居民富裕程度(pov)

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国居民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任碧云,等,2019)^[14],恩格尔系数越低,则越富裕。具体地,使用家庭食品支出占家庭总消费的份额构造恩格尔系数(缪言,等,2021)^[15]。

2. 是否获得政府公共转移支付(tr)

本文根据CFPS数据中相关政府转移支付的具

体项目和家庭收到政府转移支付总额来识别是否获得政府公共转移支付。

3. 家庭消费(lnc)

政府公共转移支付会影响不同性质的家庭消费,本文一共使用6类家庭消费变量,分别是食品($lnfood$)、衣着($lndress$)、居住($lnhouse$)、家庭设备及日用品($lndaily$)、交通通信($lntrco$)和总消费(lnc)。除了以上消费支出外,总消费支出还包括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和其他消费性支出。在实证分析中,为了减少样本量损失,对家庭各类消费为0的样本加1后再取自然对数。

4. 主观福利变量

本文使用生活满意度($sati$)、对自己未来的信心程度($conf$)和社会认同感($stat$)三个指标作为主观福利的代理变量。受访者根据自身情况评价分别赋值1到5,数值越大表示受访者生活越满意、对自己未来信心程度和社会地位越高。

5.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地区特征变量三类。个体特征包括户主性别($gender$)、户主婚姻状况($marri$)、户主受教育水平(edu)、户主工作状态($work$)、户主是否为自营工作者($prop$)。家庭特征包括人口规模($popu$)、人均年收入对数(lny)、是否获得私人转移支付($priv$)、是否获得社会捐助($soci$)。地区特征对东部($east$)、中部(mid)和西部($west$)进行控制。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1. 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福利效应

表2报告了公共转移支付福利效应的估计结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2012		2014		2016		2018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结果变量								
贫困水平	0.423	0.224	0.439	0.199	0.424	0.196	0.417	0.203
总消费对数	10.25	0.936	10.52	0.902	10.69	0.928	10.75	0.968
食品支出对数	9.230	1.405	9.543	1.172	9.664	1.039	9.712	1.176
衣着支出对数	6.707	2.118	6.909	2.131	6.986	2.101	7.040	2.211
居住支出对数	7.594	1.072	8.151	1.273	8.209	1.366	8.348	1.274
家庭设备及日用品支出对数	7.101	2.021	7.465	1.613	7.535	1.885	7.777	1.842
交通通信支出对数	7.465	1.577	7.764	1.514	7.844	1.547	7.875	1.654
生活满意度	3.345	1.022	3.742	0.992	3.597	1.074	3.597	1.074
对未来信心	3.648	1.061	3.961	1.008	3.832	1.067	4.064	0.983
社会认同感	2.661	0.987	2.904	0.949	2.805	1.059	3.078	1.031
处理变量								
是否获得公共转移支付	0	0	0.237	0.425	0.218	0.413	0.217	0.412
控制变量								
户主性别	0.420	0.494	0.431	0.495	0.433	0.496	0.423	0.494
户主婚姻状况	0.824	0.381	0.837	0.370	0.826	0.379	0.796	0.403
户主受教育水平	3.086	1.351	2.995	1.388	2.947	1.439	3.005	1.446
户主工作状态	0.477	0.500	0.641	0.480	0.614	0.487	0.593	0.491
户主是否是为自营工作者	0.0554	0.229	0.104	0.305	0.107	0.309	0.103	0.304
人口规模	3.398	1.576	3.356	1.642	3.304	1.704	3.264	1.750
人均年收入对数	9.094	1.216	8.965	2.172	9.456	1.284	9.586	1.753
是否获得私人转移支付	0.193	0.395	0.155	0.362	0.215	0.411	0.280	0.449
是否获得社会捐助	0.00318	0.0563	0.00863	0.0925	0.00863	0.0925	0.00772	0.0876
东部地区	0.549	0.498	0.551	0.498	0.551	0.497	0.551	0.498
中部地区	0.274	0.446	0.271	0.445	0.271	0.444	0.271	0.444
西部地区	0.178	0.382	0.178	0.383	0.178	0.383	0.179	0.383

果。各列回归结果均表明公共转移支付的福利增进效应显著。具体而言,第(1)列为只加入是否获得转移支付这一核心变量的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第(2)列逐一控制了个体、家庭特征变量和地区变量。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公共转移支付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获得公共转移支付有利于个体福利水平提升。考虑到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内生性问题,采用DID模型对其进行修正。第(3)列的结果表明,政策效应的估计系数为-0.0592,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统计检验。表明基准结果是稳健的,初步验证了文

本假说1,意味着政府公共转移支付提高了居民生活水平。可能原因是,一方面随着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转移支付收入在低收入群体收入中所占份额大幅提高,直接增加了低收入群体收入,从而提高了生活水平(李实,等,2016)^[16]。另一方面,政府公共转移对象识别的精准度明显提高。通常情况下,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瞄准效率的高低(宋颜群,等,2020)^[17]。特困补助、低保、五保户补助等特定类型转移支付对贫困人口瞄准效率较高,使得政府公共转移收入更多惠及低收入群体(苏春红,等,2015)^[18]。

表2 公共转移支付的福利效应

变量	(1)	(2)	(3)
	FE	FE	DID
<i>tr</i>	-0.0432*** (0.0079)	-0.0391*** (0.0079)	
<i>treat×year</i>			-0.0592*** (0.0207)
<i>gender</i>		-0.0118 (0.0290)	-0.0108 (0.0291)
<i>marri</i>		-0.0063 (0.0136)	-0.0056 (0.0136)
<i>edu</i>		-0.0001 (0.0075)	0.0008 (0.0075)
<i>work</i>		-0.0156** (0.0075)	-0.0165** (0.0075)
<i>prop</i>		-0.0086 (0.0097)	-0.0100 (0.0097)
<i>popu</i>		-0.0073** (0.0032)	-0.0077** (0.0032)
<i>lny</i>		0.0003 (0.0016)	-0.0000 (0.0016)
<i>priv</i>		-0.0167*** (0.0061)	-0.0171*** (0.0061)
<i>soci</i>		-0.0602** (0.0250)	-0.0627** (0.0248)
<i>east</i>		0.1612 (0.1048)	0.1620 (0.1050)
<i>mid</i>		0.1262 (0.1228)	0.1245 (0.1229)
<i>_cons</i>	0.4227*** (0.0038)	0.3433*** (0.0948)	0.3445*** (0.0949)
<i>N</i>	8804	8804	8804
<i>R²</i>	0.0080	0.0125	0.0105

注:***、**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2. 基于PSM-DID的福利效应再检验

对于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福利效应的检验需要克服可观测变量可能造成的估计偏误,采用PSM近邻匹配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匹配,再运用DID模型对匹配后的实验组和对照组重新估计,以确保政策实施前对照组和实验组不存在明显差异,从而满足DID共同趋势假设。

在估计之前需要检验实验组和对照组匹配效果。表3汇报了匹配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匹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各变量标准偏差均小于10%,匹配后的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匹配

变量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根据图1的倾向得分值密度函数图可以看出,在匹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倾向得分值的概率密度比较接近,总体上说明匹配效果较理想,较好地满足共同趋势假定,为下文运用DID模型回归筛选了较为可靠的样本。

表4列(1)报告了PSM-DID近邻匹配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考虑了可观测变量可能导致的估计偏误问题后,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福利增进效应依然成立。表4列(2)和列(3)更换PSM匹配方法,采用半径匹配和核匹配DID估计的结果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并无显著差异,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政

表3 PSM各变量均值平衡性检验

变量	样本	平均值		标准偏差 (%)	T检验	
		处理组	控制组		t	P> t
gender	匹配前	0.535	0.416	24.1	6.51	0.000
	匹配后	0.534	0.549	-3.0	-0.60	0.546
marri	匹配前	0.853	0.818	9.6	2.49	0.013
	匹配后	0.853	0.859	-1.7	-0.36	0.721
edu	匹配前	2.148	3.094	-75.6	-18.43	0.000
	匹配后	2.151	2.152	-0.1	-0.02	0.982
work	匹配前	0.737	0.566	36.6	9.41	0.000
	匹配后	0.737	0.732	1.1	0.23	0.820
prop	匹配前	0.064	0.095	-11.5	-2.88	0.004
	匹配后	0.064	0.065	-0.5	-0.10	0.919
popu	匹配前	3.815	3.283	31.0	8.62	0.000
	匹配后	3.809	3.918	-6.4	-1.14	0.256
lny	匹配前	8.740	9.328	-38.7	-9.52	0.000
	匹配后	8.739	8.743	-0.3	-0.05	0.961
priv	匹配前	0.253	0.207	10.9	3.03	0.002
	匹配后	0.253	0.236	4.2	0.82	0.414
soci	匹配前	0.020	0.006	12.7	4.62	0.000
	匹配后	0.018	0.016	1.1	0.19	0.846
east	匹配前	0.333	0.275	-49.5	-13.05	0.000
	匹配后	0.334	0.195	-5.2	-1.05	0.292
mid	匹配前	0.235	0.572	-9.3	-2.44	0.015
	匹配后	0.236	0.359	9.3	1.95	0.0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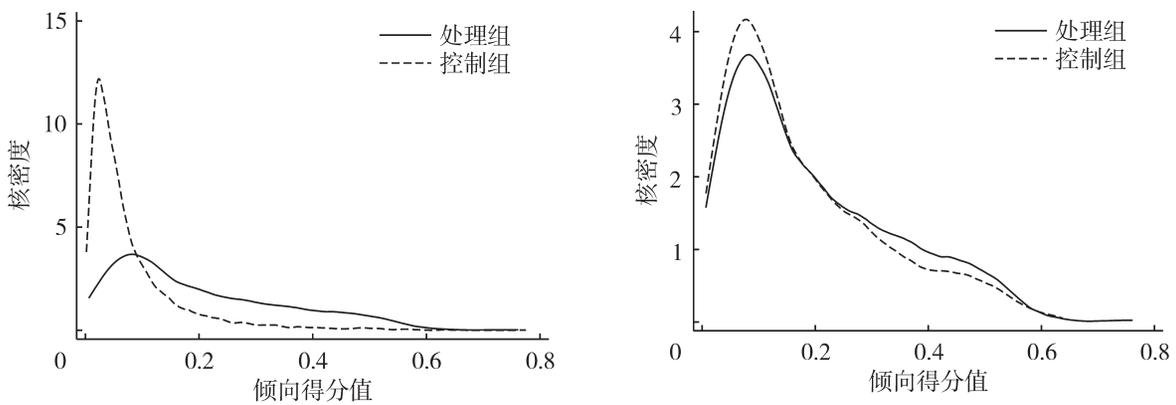


图1 匹配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倾向得分值的核密度分布对比

府公共转移支付的福利增进效应是十分显著的。

3. 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福祉增进效应:物质福利与主观福利

到目前为止,本文已经稳健地证实了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福利效应。下面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

分别对公共转移支付的物质福利效应和主观福利效应加以检验。

消费水平不仅能反映个体物质生活水平,而且能够全面地刻画家庭经济福利水平(Mcgregor and Boroah, 1992)^[9]。例如,在个体当期收入受到冲击

表4 公共转移支付的福利效应(PSM-DID)

变量	(1)	(2)	(3)
	近邻匹配	半径匹配	核匹配
<i>treat×year</i>	-0.0497** (0.0200)	-0.0495*** (0.0148)	-0.0496*** (0.0148)
<i>gender</i>	-0.0145 (0.0304)	-0.0145 (0.0271)	-0.0130 (0.0271)
<i>marri</i>	-0.0012 (0.0138)	-0.0012 (0.0124)	-0.0028 (0.0124)
<i>edu</i>	-0.0015 (0.0075)	-0.0014 (0.0071)	-0.0017 (0.0071)
<i>work</i>	-0.0087 (0.0076)	-0.0089 (0.0070)	-0.0091 (0.0070)
<i>prop</i>	-0.0085 (0.0100)	-0.0068 (0.0105)	-0.0088 (0.0105)
<i>popu</i>	-0.0073** (0.0032)	-0.0074*** (0.0027)	-0.0074*** (0.0027)
<i>lny</i>	-0.0010 (0.0016)	-0.0010 (0.0016)	-0.0010 (0.0016)
<i>priv</i>	-0.0188*** (0.0061)	-0.0196*** (0.0061)	-0.0190*** (0.0061)
<i>soci</i>	-0.0442* (0.0251)	-0.0442 (0.0274)	-0.0442 (0.0274)
<i>east</i>	0.1554 (0.1629)	0.1552 (0.1411)	0.1540 (0.1413)
<i>mid</i>	0.1187 (0.1707)	0.1187 (0.1358)	0.1173 (0.1359)
<i>_cons</i>	0.3674*** (0.1386)	0.3679*** (0.1174)	0.3699*** (0.1175)
<i>N</i>	8658	8655	8661

而出现明显减少甚至当期收入为0的情况下,仍可以利用自身的储蓄进行消费(Slesnick, 1993; Zaidi and de Vos, 2001; Jorgenson and Slesnick, 1987)^[20-22],反映了个体支配资源的能力(徐月宾,等,2007)^[23],同时意味着稳定的消费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经济资源的充裕程度(Jorgenson and Dale, 1998)^[24]。除此之外,为获取或者继续保留“贫困户”资格,贫困家庭可能会在接受调查时低报收入,获得政府公共转移支付(Meyer and Sullivan, 2003)^[25],显然会对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带来误差。而消费相比收入,更

能综合体现个人的福利水平(周广肃,等,2020; Short et al., 1998)^{[26]-[27]}。因此,本文聚焦各类消费,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检验公共转移支付的物质福利效应。

表5报告了公共转移支付对各分类消费的影响。根据第(1)到第(6)列的估计结果,公共转移支付增加了总消费、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日用品和交通通信支出。其中,公共转移支付使食品支出增加17.4%,居住支出增加71.7%,家庭设备及日用品支出增加62%,交通通信支出增加45.2%,均至少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由此可见,公共转

表5 公共转移支付的物质福利效应检验(PSM-DID近邻匹配)

变量	(1)	(2)	(3)	(4)	(5)	(6)
	<i>lnc</i>	<i>lnfood</i>	<i>lndress</i>	<i>lnhouse</i>	<i>lndaily</i>	<i>lntrco</i>
<i>treat</i> × <i>year</i>	0.2201*** (0.0532)	0.1741** (0.0781)	0.2400* (0.1252)	0.7170*** (0.0895)	0.6204*** (0.1251)	0.4519*** (0.0841)
<i>gender</i>	0.0567 (0.0974)	0.2087 (0.1430)	-0.1178 (0.2291)	-0.0634 (0.1637)	-0.2886 (0.2289)	-0.1332 (0.1539)
<i>marri</i>	0.1827*** (0.0446)	0.1249* (0.0655)	0.2702*** (0.1049)	0.1218 (0.0750)	0.2519** (0.1048)	0.0545 (0.0705)
<i>edu</i>	-0.0862*** (0.0257)	-0.0557 (0.0377)	0.0873 (0.0604)	-0.1937*** (0.0431)	0.0432 (0.0603)	-0.0643 (0.0405)
<i>work</i>	0.0979*** (0.0251)	0.0834** (0.0368)	0.2335*** (0.0590)	0.2069*** (0.0422)	0.1043* (0.0590)	0.2213*** (0.0397)
<i>prop</i>	0.2168*** (0.0376)	0.2133*** (0.0552)	0.1698* (0.0885)	0.3929*** (0.0632)	0.3863*** (0.0884)	0.2120*** (0.0594)
<i>popu</i>	0.1026*** (0.0098)	0.0773*** (0.0144)	0.2128*** (0.0230)	0.0852*** (0.0165)	0.0878*** (0.0230)	0.1561*** (0.0155)
<i>lny</i>	0.0478*** (0.0057)	0.0640*** (0.0084)	0.0667*** (0.0135)	0.0229** (0.0097)	0.0725*** (0.0135)	0.0472*** (0.0091)
<i>priv</i>	0.0622*** (0.0220)	-0.0470 (0.0323)	-0.0987* (0.0518)	0.0814** (0.0370)	0.0697 (0.0518)	-0.0467 (0.0348)
<i>soci</i>	0.1561 (0.0985)	-0.0473 (0.1446)	-0.4303* (0.2317)	0.0491 (0.1656)	-0.2971 (0.2315)	-0.0969 (0.1556)
<i>east</i>	-0.1879 (0.5069)	0.2256 (0.7442)	-0.8935 (1.1925)	0.7291 (0.8523)	-0.8261 (1.1915)	-1.3117 (0.8011)
<i>mid</i>	-0.5374 (0.4878)	-0.0570 (0.7161)	-0.5063 (1.1474)	-0.0917 (0.8201)	-0.4693 (1.1464)	-1.2893* (0.7708)
<i>_cons</i>	9.9815*** (0.4216)	8.4748*** (0.6189)	5.6223*** (0.9916)	7.4763*** (0.7088)	6.7099*** (0.9908)	7.8729*** (0.6662)
<i>N</i>	8658	8658	8658	8658	8658	8658

移支付的物质福利效应显著存在,并且居民恩格尔指数的下降并不是以食品消费支出减少为代价,这表明,公共转移支付真正改善了居民生活水平。

一般而言,个体满意度相较于幸福感在度量主观福利时有着更好的区分度,比较符合中国人在情感用词上的谦虚表达(邓睿,等,2022)^[28]。个体对未来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了对更高生活目标的追求、对自身未来发展的期望和志向水平,提振脱贫信心是实现长效脱贫的关键(解垚,等,2022)^[13]。社会地位能够综合反映个人能力和资源,对低收入群体的

主观福利有重要影响(刘军强,等,2012)^[30]。通常,社会地位低的个体不及社会地位高的个体拥有较高的能力和声望,自身发展机会较少,更容易陷入贫困(卢海阳,等,2019)^[31]。因此,为了验证公共转移支付的主观福利效应,本文通过将个体生活满意度、对未来的信心和主观社会认同感引入模型来进行验证。

表6报告了公共转移支付对个体幸福感、对未来的信心和社会地位认同的影响。可以看出,获得公共转移支付的个体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提高了个体生活满意度、对未来的信心和社会地位认同

表6 公共转移支付的主观福利效应检验(PSM-DID近邻匹配)

变量	(1)	(2)	(3)
	<i>sati</i>	<i>conf</i>	<i>stat</i>
<i>treat</i> × <i>year</i>	0.2830*** (0.0654)	0.3003*** (0.0721)	0.2762*** (0.0693)
<i>gender</i>	-0.1103 (0.1197)	0.0140 (0.1320)	-0.1659 (0.1267)
<i>marri</i>	-0.1115** (0.0548)	-0.0747 (0.0604)	-0.0291 (0.0580)
<i>edu</i>	-0.1054*** (0.0315)	-0.0650* (0.0348)	-0.0794** (0.0334)
<i>work</i>	0.0705** (0.0308)	0.1092*** (0.0340)	0.0434 (0.0327)
<i>prop</i>	0.1153** (0.0462)	0.0593 (0.0510)	0.1418*** (0.0490)
<i>popu</i>	-0.0181 (0.0120)	-0.0019 (0.0133)	0.0240* (0.0127)
<i>lny</i>	0.0095 (0.0071)	0.0181** (0.0078)	0.0203*** (0.0075)
<i>priv</i>	0.0169 (0.0271)	0.0606** (0.0298)	0.0726** (0.0287)
<i>soci</i>	0.0932 (0.1210)	-0.2028 (0.1335)	0.0749 (0.1282)
<i>east</i>	-1.0024 (0.6230)	-0.0673 (0.6870)	0.1316 (0.6598)
<i>mid</i>	-0.8419 (0.5995)	-0.2842 (0.6610)	0.2405 (0.6348)
<i>_cons</i>	4.6940*** (0.5181)	3.9755*** (0.5713)	2.7108*** (0.5487)
<i>N</i>	8658	8658	8658

感,有利于实现增进民生福祉这一终极目标,再次验证了假设1。

(二)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福利效应机制检验

上文验证了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可以增加个体的物质福利和主观福利来提高居民福利水平,促进实现共同富裕。前面提到,这一影响机制的成立依赖于公共转移支付的风险分担作用,我们采取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检验模型如下:

$$Risk_{it} = \beta_0 + \beta_1 treat_{it} \times year_t + \beta_2 X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3)$$

$$Pov_{it} = \gamma_0 + \gamma_1 treat_{it} \times year_t + \gamma_2 Risk_{it} + \gamma_3 X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4)$$

其中, $Risk_{it}$ 表示风险程度(高风险为1,低风险为0);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黄露露,2022;王春超,等,2016)^[32-33],本文采用年平均医疗保健支出、家庭存款、是否有商业保险三个变量来衡量风险程度,将家庭年平均医疗保健支出高于中位数的家庭、家庭存款低于中位数的家庭分别定义为高风险I($risk$ I)和高风险II($risk$ II),没有购买商业保险的家庭视为高风险III($risk$ III)。

表7报告了机制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公共转移

表7 公共转移支付的风险分担效应 (PSM-DID 近邻匹配)

变量	(1)	(2)	(3)	(4)	(5)	(6)
	<i>risk I</i>	<i>pov</i>	<i>risk II</i>	<i>pov</i>	<i>risk III</i>	<i>pov</i>
<i>treat×year</i>	-0.0671** (0.0342)	-0.0586*** (0.0154)	-0.0887** (0.0351)	-0.0417*** (0.0145)	-0.0966*** (0.0289)	-0.0484*** (0.0148)
<i>risk I</i>		0.0141** (0.0056)				
<i>risk II</i>				0.0899*** (0.0051)		
<i>risk III</i>						0.0139** (0.0064)
<i>gender</i>	0.0238 (0.0612)	-0.0151 (0.0271)	-0.0471 (0.0641)	-0.0103 (0.0265)	0.0057 (0.0529)	-0.0146 (0.0271)
<i>marri</i>	0.0837*** (0.0281)	-0.0049 (0.0125)	-0.0473 (0.0294)	0.0031 (0.0121)	-0.0155 (0.0242)	-0.0010 (0.0124)
<i>edu</i>	0.0341** (0.0162)	0.0008 (0.0073)	0.0199 (0.0169)	-0.0033 (0.0070)	-0.0015 (0.0139)	-0.0015 (0.0071)
<i>work</i>	-0.0362** (0.0158)	-0.0125* (0.0071)	0.0373** (0.0165)	-0.0120* (0.0068)	-0.0463*** (0.0136)	-0.0080 (0.0070)
<i>prop</i>	0.0354 (0.0237)	-0.0109 (0.0105)	-0.0920*** (0.0248)	-0.0003 (0.0103)	-0.1615*** (0.0204)	-0.0063 (0.0105)
<i>popu</i>	-0.0009 (0.0062)	-0.0074*** (0.0027)	-0.0336*** (0.0064)	-0.0043 (0.0027)	-0.0196*** (0.0053)	-0.0071*** (0.0027)
<i>lny</i>	0.0141*** (0.0037)	-0.0003 (0.0016)	-0.0144*** (0.0038)	0.0003 (0.0016)	-0.0098*** (0.0031)	-0.0008 (0.0016)
<i>priv</i>	-0.0022 (0.0139)	-0.0159** (0.0062)	-0.0480*** (0.0145)	-0.0145** (0.0060)	0.0005 (0.0120)	-0.0188*** (0.0061)
<i>soci</i>	-0.0185 (0.0618)	-0.0468* (0.0274)	-0.0459 (0.0649)	-0.0401 (0.0268)	0.0630 (0.0535)	-0.0451 (0.0274)
<i>east</i>	0.0136 (0.3185)	0.1560 (0.1411)	0.4880 (0.3339)	0.1115 (0.1380)	0.4348 (0.2755)	0.1493 (0.1412)
<i>mid</i>	-0.0056 (0.3065)	0.1215 (0.1358)	0.5784* (0.3213)	0.0666 (0.1328)	0.3726 (0.2651)	0.1135 (0.1359)
<i>_cons</i>	0.0705 (0.2677)	0.3434*** (0.1176)	0.3729 (0.2777)	0.3339*** (0.1148)	0.6273*** (0.2291)	0.3587*** (0.1175)
<i>N</i>	8658	8658	8658	8658	8658	8658

支付显著减少个体所面临的风险程度,且至少在5%的水平下显著,进一步将不同条件下的风险程度放进模型中,政策效应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负,由此验证了假设2,意味着公共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分担个体风险,减少风险敞口实现福利增进,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三)异质性分析

1.个体特征差异

考虑到差异化的群体特征可能会影响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福利效应,本部分将基于个体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年龄三个方面考察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福利效应的异质性。关于个体特征的异质性,首

先是性别差异,表8列(1)和列(2)根据受访者性别分组。由表可知,相较女性,公共转移支付对男性具有明显的福利增进效应,对女性没有显著影响。可能原因是男女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导致男性和女性不能享有相同的资源。与经济地位较低的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从政府公共转移支付获取直接的经济支持,不易受到经济约束,从而能够提高个人经济福利。其次是受教育程度差异,表8列(3)和列(4)分别对受教育程度高、低的群体进行分样本回归,其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被定义为受教育程度高。可以看出,公共转移支付对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群体福利增进效应更明显,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通过政府公共

转移支付,有机会使原本教育程度不足的个体改变自身贫困状态。再则,就年龄差异而言,表8的列(5)至列(7)展示了按受访者年龄划分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其中年龄为18岁—44岁的受访者定义为青年,年龄为45岁—60岁的受访者定义为中年,年龄为60岁以上的定义为老年。从结果可以看出,公共转移支付对青年和中年的福利增进效应明显高于老年群体。可能的原因是,相较于青年和中年群体,老年群体劳动能力较弱甚至丧失劳动能力。青年和中年群体更容易利用政府公共转移支付进行生产性投资,通过促进农业生产,实现生产改善,从而增加农业产出帮助低收入群体实现福利提升(田勇等,2019)^[32]。

表8 公共转移支付的福利效应:个体特征异质性(PSM-DID近邻匹配)

变量	(1)	(2)	(3)	(4)	(5)	(6)	(7)
	男性	女性	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	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	青年(18岁—44岁)	中年(45岁—60岁)	老年(60岁以上)
<i>treat</i> × <i>year</i>	-0.0894*** (0.0283)	0.0017 (0.0282)	-0.0597*** (0.0216)	0.0477 (0.0477)	-0.0643** (0.0265)	-0.0621** (0.0261)	-0.0021 (0.033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i>_cons</i>	0.4681*** (0.1438)	0.4125*** (0.0597)	0.4803*** (0.0792)	0.3615** (0.1507)	0.4081*** (0.1205)	0.2679** (0.1051)	0.4385*** (0.1542)
<i>N</i>	3709	4949	5814	2844	2620	3265	2767

2. 地区差异

从地区差异来看,总体呈现出在欠发达地区福利增进效应更明显的特征。就城乡差异而言,与城市相比,公共转移支付更有利于提高农村福利水平。从不同区域上来看,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相比,公共转移支付对西部地区有显著的福利增进效应。

这意味着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在欠发达地区脱贫攻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有利于欠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提升以促进生活质量改善。因此,在实现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公共转移支付依然大有可为。

表9 公共转移支付的福利增进效应:地区异质性(PSM-DID近邻匹配)

变量	(1)	(2)	(8)	(9)	(10)
	城镇	乡村	东部	中部	西部
<i>treat</i> × <i>year</i>	0.0075 (0.0264)	-0.0486** (0.0201)	0.0038 (0.0322)	-0.0222 (0.0319)	-0.0892** (0.035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i>_cons</i>	0.3296* (0.1836)	0.4692*** (0.0498)	0.5010*** (0.0430)	0.5770*** (0.0594)	0.3424*** (0.0755)
<i>N</i>	5935	2723	4716	2378	1564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12年到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DID)模型、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模型等研究方法,以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风险分担属性为切入点,在检验了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具有福利增进效应的基础上,探讨了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物质福利和主观福利效应,揭示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增进居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放宽经济约束,增加低收入群体的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日用品和交通通信等消费支出提高个体的物质福利,也可以通过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对未来信心和社会地位认同感增进主观福利。进一步探究发现,政府公共转移支付能够帮助低收入群体分担健康、收入风险,增进个体福利。从分样本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对男性、低教育程度、中青年、农村及中西部群体的福利增进效应更大。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提高民众福祉,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规范公共转移支付的实施。鉴于获得政府公共转移支付有效增进了民众福祉,在保证当前财政投入力度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公共转移支付的发放、领取和使用,加强公共转移支付政策监管制度,提高政府转移支付的精准性,使得政府转移支付能够真正有效地送达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手中。增强政策的公平性,以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物质生活所需为基础,放宽经济约束以提高低收入群体应对健康、收入等风险冲击的能力,能够更好地满足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和精神需求,从而提高政府转移支付的政策效果。

其次,引导转移支付资金向女性、老年人等弱势群体倾斜。根据低收入群体的具体特征和需求,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政府公共转移支付政策。政府

一味增加现金转移支付不仅不利于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可持续增长,反而可能会产生福利依赖现象。政府转移支付在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同时应当避免过度帮扶,重点关注女性和老年人的贫困问题,强化政府公共转移支付对此类群体的福利提升作用,通过完善公共转移支付政策设计,对公共转移支付结构进行合理优化,并具体根据低收入群体的差异性特征给予恰当的转移支付,从而促进低收入家庭成员自身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最后,优先保障低收入地区的公共转移支付力度,将公共转移支付与“乡村振兴”有效结合。加强完善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环境、交通、教育和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福利增进效应的发挥提供必要条件。通过制定差异化的转移支付政策,进一步增强对相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对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投入倾斜程度,通过提高政府转移支付给付标准,确保中西部低收入群体能够从中获益。同时,重视区域间对口支援,实现区域间协同发展,推广帮扶经验,从而促进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 [1] 范燕丽,丛树海,郝曼.从“争穷保帽”到“主动摘帽”:正向激励与农民持续增收[J].财政研究,2021(12):63-78.
- [2] 韩华为,高琴.中国城市低保救助的主观福利效应——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J].社会保障评论,2018,2(03):82-97.
- [3] 刘穷志.增长、不平等与贫困:政府支出均衡激励路径[J].财贸经济,2008(12):58-62.
- [4] 卢盛峰,陈思霞,时良彦.走向收入平衡增长:中国转移支付系统“精准扶贫”了吗? [J].经济研究,2018,53(11):49-64.
- [5] 边恕,张铭志.扶贫转移支付对城乡消费差异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21(03):56-68+127.
- [6] 尹志超,郭沛瑶.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家庭消费视角下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21,37(04):64-83.

- [7] Banerjee Abhijit V, Duflo Esther. What Is Middle Class About The Middle Classes Around The World?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 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8, 22(2).
- [8] Luigi Guiso, Monica Paiella. Risk Aversion, Wealth, and Background Risk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8, 6(6).
- [9] Johannes Haushofer, Ernst Fehr. On the Psychology of Poverty [J]. Science, 2014, 344(6186).
- [10] 洪名勇, 吴昭洋, 龚丽娟. 贫困心理陷阱理论研究进展 [J]. 经济学动态, 2018(07): 101-114.
- [11] 徐富明, 张慧, 马红宇, 等. 贫困问题: 基于心理学的视角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7, 25(08): 1431-1440.
- [12] 李树, 严莱. 幸福经济学研究最新进展 [J]. 经济学动态, 2022(12): 123-139.
- [13] 解垚, 李敏. 政府公共转移支付的扶志效应 [J]. 中国人口科学, 2022(01): 99-112+128.
- [14] 任碧云, 王雨秋. 包容性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贫困减缓——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的分析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9(10): 45-56.
- [15] 缪言, 白仲林, 尹彦辉. 财政支出政策的减贫效应: 相对贫困治理视角 [J]. 经济学动态, 2021(09): 120-133.
- [16] 李实, 詹鹏, 杨灿. 中国农村公共转移收入的减贫效果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3(05): 71-80.
- [17] 宋颜群, 解垚. 政府转移支付的扶贫效率、减贫效应及减贫方案选择 [J]. 当代经济科学, 2020, 42(02): 1-15.
- [18] 苏春红, 解垚. 财政流动、转移支付及其减贫效率——基于中国农村微观数据的分析 [J]. 金融研究, 2015(04): 34-49.
- [19] P.P.L. McGregor, V.K. Borooah. Is Low Spending or Low Income a Better Indicator of Whether or Not a Household is Poor: Some Results From the 1985 Family Expenditure Survey [J].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992, 21(1).
- [20] Daniel T. Slesnick. Gaining Ground: Poverty in the Post-war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 101(1).
- [21] M. Asghar Zaidi, Klaas de Vos. Trends in Consumption-Based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during the 1980s [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1, 14(2).
- [22] Jorgenson D, Slesnick D. Aggregate Consumer Behavior and Household Equivalence Scales [J].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1987, 5(2).
- [23] 徐月宾, 刘凤芹, 张秀兰. 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反思——从社会救助向社会保护转变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03): 40-53+203-204.
- [24] Dale W. Jorgenson. Did We Lose the War on Poverty? [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 12(1).
- [25] Meyer B, Sullivan J. Measuring the Well-Being of the Poor Using Income and Consumption [J].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3, 38.
- [26] 周广肃, 张牧扬, 樊纲. 地方官员任职经历、公共转移支付与居民消费不平等 [J]. 经济学(季刊), 2020, 19(01): 61-80.
- [27] Kathleen Short, Martina Shea, David Johnson, Thesia I. Garner. Poverty-Measurement Research Using the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 and the 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2).
- [28] 邓睿, 郑强. 居住空间融合能否带来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基于农民工城市社区居住状况的经验研究 [J]. 人口与发展, 2022, 28(04): 28-38.
- [29] 刘军强, 熊谋林, 苏阳. 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12): 82-102+207-208.
- [30] 卢海阳, 郑旭媛. 禀赋差异、议价能力与农民工工资——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 [J]. 农业技术经济, 2019(06): 97-106.
- [31] 黄露露. 社会网络、风险分担与家庭储蓄率——来自中国城镇居民的证据 [J]. 经济学(季刊), 2022, 22(01): 87-108.
- [32] 王春超, 袁伟. 社会网络、风险分担与农户储蓄率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6(03): 25-35+53.
- [33] 田勇, 殷俊, 薛惠元. “输血”还是“造血”? 面向农户的公共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评估——基于农业产出的视角 [J]. 经济问题, 2019(03): 78-86.

【责任编辑 张经纬】